



跟

曹俊杰 著

毛泽东

学思维  
方法与策略

西苑出版社

ISBN 978-7-80108-844-4



9 787801 088444

定价：49.80元（全两册）



# 学思维 方法与策略

跟

曹俊杰 著

毛泽东

思维策略  
方法与学

西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跟毛泽东学思维/曹俊杰编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80108-844-4

I. 跟… II. 曹… III. 毛泽东 (1893~19760) —思维方法—研究  
IV. A841. 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2183 号

### 跟毛泽东学思维方法与策略

- 
- 编 著 曹俊杰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88624971 传 真: 010-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印 张 25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08-844-4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十 跟毛泽东学分析方法/1
- 分析与实践智慧/2
- 毛泽东是怎样运用分析方法的/4
- 跟毛泽东学分析方法/11
- 十一 跟毛泽东学综合方法/33
- 综合与思维/34
- 毛泽东是怎样运用综合方法的/37
- 跟毛泽东学综合/38
- 十二 跟毛泽东学抽象与概括/46
- 抽象与概括/48
- 毛泽东是怎样进行抽象和概括的/52
- 跟毛泽东学抽象与概括/57
- 十三 跟毛泽东学归纳与演绎/61
- 归纳和演绎/62
- 毛泽东是怎样运用归纳与演绎的/65
- 跟毛泽东学归纳与演绎/66



- 十四 跟毛泽东学预测方法/72
- 关于预测/73
  - 毛泽东是怎样预测的/78
- 十五 跟毛泽东学决策思维/102
- 决策与决策思维/104
  - 毛泽东是怎样进行决策思维的/116
  - 跟毛泽东学决策思维/135
- 十六 跟毛泽东学矛盾思维/150
- 矛盾、事物与过程/151
  - 毛泽东是怎样进行矛盾思维的/153
  - 跟毛泽东学矛盾思维/158
- 十七 跟毛泽东学系统思维/164
- 系统与系统思维/166
  - 毛泽东对系统思维的运用/168
  - 毛泽东运用系统思维的启示/175
- 十八 跟毛泽东学形象思维/177
- 毛泽东对形象思维的运用/178
  - 毛泽东运用形象思维的启示/184
- 十九 跟毛泽东学创造性思维/190
- 毛泽东对创造性思维的运用/191
  - 毛泽东运用创造性思维的启示/197
- 二十 跟毛泽东学思维策略/203
- 毛泽东对思维策略的运用/203
  - 毛泽东有关思维策略的思想/210

## 十 跟毛泽东学分析方法

从前有两个人，跟着老师学道，一起到另一个国家去，路上看见大象的脚迹。一个人说：“这是头雌象，肚里还怀着只小雌象，一只眼睛是瞎的，象背上坐得有一个妇人，肚里也怀着一个女孩。”

另一个人问：“你怎么知道？”

第一个人说：“我是经过推理和思考知道的。你不相信，到前面就会看见。”

两人追上大象，果然是这么回事。他们追上象后，大象生下一只小雌象，妇人生下一个女孩。这样，另一个人心里就想：“我和他一起跟着老师学道，为什么我独独看不出来呢？”回到老师那里，他问老师：“我们两人一起赶路，他只是见到大象的脚迹，就知道好多事情，我却看不出来。请老师指教我，让我也明白其中的道理。”

于是老师把那一位学生叫来，问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学生回答说：“这是老师常说过的。我看见大象小便的地方，知道这是头雌象。看见它右脚踏地的痕迹深，知道这象怀的是只小雌象。看见道路右边的草没有动，知道它右眼睛是瞎的。看见大象停脚的地方有小便的痕迹，知道坐在象上的是女人。看见女人右脚踏地的痕迹深，知道她怀的是女孩。我是凭着仔细的推理和思考知道这些的。”

老师说：“学习就应当动脑筋思考，仔细思考就能有所成就。马马虎虎，不动脑筋的人不会有什么结果，这不是老师的



过错呀。”

这是《佛经故事选》中的一则故事。故事中的学生之一之所以具有先见之明，主要是他善于分析和推理。善于分析和推理就能见微知著，能看出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就具有智慧。可见这两种思维方法是十分重要的，而在这两种思维方法中，分析是所有思维方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思维方法。本章我们就来看看毛泽东对分析方法的论述和运用。

## 分析与实践智慧

分析与综合是最基本的思维方法，也是最重要的思维方法。而在分析与综合中，分析又是综合的前提。可见分析在思维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基础地位。

正因为分析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思维方法，而实践的成败在客观条件已具备时又主要取决于人的思维能力，所以分析是决定实践智慧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的经历中获得证明。

纵观毛泽东探索和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可以看出，实践智慧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这种实践智慧剧烈地改变着中国的历史以至巴基斯坦前总统评价道：“他使历史显得渺小。”而毛泽东关注最多并且特别强调的思维方法就是分析。无论是在谈话、各种著作还是读书批注中，都有毛泽东对分析方法的说明及对分析方法重要性的强调。

毛泽东在读《通鉴纪事本末》时就对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作过批注。

西晋末年以至东晋于江南立业以后，北中国先后出现了16个由少数民族或汉族人士建立的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统治着黄河以北数州之地，一时势力最为强盛。石勒一步步走向成功，张宾起了关键的作用。毛泽东阅读南宋人袁枢撰写的《通鉴纪事本末》时，特意翻看了《石勒寇河朔》一节，并在张宾献计处旁批：“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这是称赞张宾提议出奇兵偷袭幽州（今河北涿县）时，通过分析各种因素认为有把握取得成功这件事的。

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族刘氏“汉”政权出兵南下，攻陷了洛阳，俘获了晋怀帝。永嘉七年（313），怀帝被杀，逃到关中的司马邺即位，成了西晋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即晋愍帝。当时北中国的局势很混乱，晋愍帝维持的长安小朝廷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不过苟延残喘罢了。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州治设于今山西太原附近）刺史刘琨，虽然仍是晋臣，可鉴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他两人也无所作为。刘琨在并州受到眼皮底下匈奴“汉”军的驱迫，立足很难；王浚引北部鲜卑、乌桓势力为援，北方士民也纷纷投奔而来，可他无匡复晋室之心，却有自立称帝的打算，而且日子也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石勒率兵屯于襄国（今河北邢台附近），名义上是匈奴“汉”政权的大将，实际上也想占地为王。314年，石勒想偷袭王浚，可又犹豫不决。这时候，他的高参张宾帮他拿定了主意。张宾分析说，打幽州，并州刘琨及北部鲜卑、乌桓这三方没有出兵助王浚的谋议，此其一；王浚、刘琨之间，关系如同仇敌，刘琨不可能为救王浚而来袭击我们，此其二。为了万无一失，张宾还建议：第一，向刘琨修笺，送质请和；第二，兵贵神速，北上行军不能泄密，要轻军往返。结果，石勒坚定了信心，依计而行，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幽州，活捉了王浚，奇袭大获成功。

这一事例本身，一方面印证了实践智慧对实践的成功具有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分析是获取实践智慧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从毛泽东对分析的重视及其本身具有的高度的实践智慧来看，分析是其获得实践智慧的重要的甚至决定的因素。其实毛泽东本人对于分析与实践智慧的关系也持同样的观点。

1965年他在一次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分析很重要。‘庖丁解牛’，就因为他掌握了分析的要领，恩格斯在接触医学时，就很重视解剖学。”毛泽东把分析看做是一种类似医学上的解剖学的方法，认为只有善于分析，掌握了分析的要领，才能娴熟地处理和理解事物。

在毛泽东看来，人们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的矛盾，而对事物矛盾

的认识离不开分析。毛泽东说：“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他认为，人们认识事物，总得要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这些都离不开分析。提出问题首先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这样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这里已经要用到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要作系统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系统周密的分析过程。毛泽东认为，一个人的分析能力的大小往往决定了他的工作能力的大小，例如会打仗不会打仗，不在于读过多少本军事书，而在于他是否善于分析敌我斗争形势。他在1965年杭州会议的讲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能够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自己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毛泽东的这段话充分说明，分析是何等重要！而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巨人，与他的分析能力不能说没有关系。善于分析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主要因素。

## 毛泽东是怎样运用分析方法的

### ◎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

分析方法是十分重要的思维方法，没有分析就不可能产生对事物正确深入的认识；只有对事物进行透彻的分析才能获得对事物透彻的认识。

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即由模糊或混沌的整

体分解为多个部分，然后对各个部分逐一进行考察而对于复杂的事物往往还要进行多层级的分析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事物的要素、结构、功能、本质和规律等。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以这类事物的理论作为分析的框架，以此事物的系统事实为分析的材料。

分析方法之所以重要，其次是由认识的规律决定的。认识的一大规律是：认识都是从个别或特殊开始的，并且经过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多次循环往复的过程完成对个别即具体事物的认识。而这些个别往往是事物的一种现象（或说一个事实）。但无论是对事物的特征、特点、要素、结构和功能的认识，还是对事物本质、规律、条件及其发展可能等的认识都是从事物的个别现象或个别事实开始的，并且是以事物的系统现象或系统事实的总和为根据的。由于任何一种个别现象或个别事实都不可能显示事物所有部分与整体的全部信息，而只是表现出其一个部分或几个部分、方面的信息，但个别都不是纯粹的，这就是说，即使主要是表现一个部分的信息，在其现象中也都包含着一些非本质的、偶然的因素，也都需要对其进行分析、比较、鉴别和剔除，才能将其本质性的东西抽象出来；当一个现象表现出多个部分或方面的信息时就更需要分析了。所以从认识本身的规律来看，分析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一切对事物的理性认识都是建立在对事物的事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舍此别无他途。

由于事物的每一个现象或事实都是通过实践认识的，甚至是通过实践产生的，而实践是一步一步地进行的，所以对事物的感性认识是一步一步地获得的。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往往也是一步一步地进行和获得的。可见，认识走着如下的道路：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一般都是由零碎到系统、由片面到全面，即由部分到整体、由局部到全局的，这是认识的规律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时不要急于求成，要耐心细致地一步一步地对事物的现象或事实进行分析与综合等，既要在分析的时候做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又要在综合的时候“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要能从整体或全局上认识事物，又要能从细节上把握事物，这样才算获得了对事物全面深入的认识。

分析方法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分析几乎是其他一切思维方法如比较、抽象、推理与综合等的前提和基础。

毛泽东不仅强调分析的重要性，而且在怎样分析上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著名的《矛盾论》其实就是一篇分析方法的理论，《论持久战》等则为我们提供了运用矛盾理论分析实际事物的具体例子，其他的一些著作以及一些言行也都体现出毛泽东善于分析的品格。下面再来看两个例子。

一是毛泽东与专列列车员姚淑贤的交谈。

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乘专列在湖南视察。其间，他的女儿李敏代他为亲人扫了墓。

有一天，在列车启动后，毛泽东与工作人员一起聊天。李敏说，给祖父、祖母扫墓时，看到好多算卦的。还说，扫墓时还听到有人骂毛泽东。恰巧，这时列车服务员姚淑贤走了进来。毛泽东坦然地笑着说：“小姚，我女儿去扫墓，说还有人骂我呢。”小姚严肃地说：“肯定是阶级敌人！”毛泽东仍在笑：“不对，不能说的这么绝对。有人骂是正常的，没人骂是不正常的。骂我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好人有时也会骂人的。因为我也不是一贯正确嘛。”

专列内，气氛平静。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继续说：“我也是个人，毛泽东也是个人。人总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什么高瞻远瞩，不是那么回事。我死后，我搞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人骂，有些会被实践证明不对。我是人，是人就有错误。但我有信念，我还是要革命，别人骂什么我也还是要革命……”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骂我”的现象进行分析；又以自知之明的认真态度，严格解剖自己，并毫不含糊地批判了那种过分吹捧他的言论。这些，表现了毛泽东谦虚务实、实事求是的伟人风范，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二是毛泽东与太行区委书记陶鲁笏等人的谈话。

1949年4月25日。香山脚下的双清别墅。

毛泽东接见山西太行区委书记陶鲁笏和冷楚、周壁。待大家坐定后，毛泽东亲切地问：“你们来北平开的什么会呀？”

“主要是学习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陶鲁笏回答。

“噢，有什么看法吗？”毛泽东谦虚地问。

三人相互对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那么，有什么体会也好嘛。”毛泽东进一步启发说。

三个人想了想，还是陶鲁笏先开了口：“我体会，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向城市了，转向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了，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学习新的知识……”

其他二人也说：“需要我们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

“主席所说的与不拿枪的敌人作斗争将更复杂更不容易，我印象最深啦。”

“敌人的枪炮换成了‘糖衣炮弹’，‘我们要警惕被它击中……’”

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地说了一阵。

“你们的体会很不错嘛。”毛泽东一直注意地听，看看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发言：

“今天我给你们讲讲‘四面八方’的问题。工作重心转到城市后，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接着，毛泽东展开来讲：“这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其精神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

在于联合民族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亦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毛泽东归结道：“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的错误、原则的错误。”他已经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得很高了，“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毛泽东的讲话出乎陶鲁笳等人的预料，深深震撼着他们的心。

毛泽东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阐述了工作重心转到城市后的经济政策，分析全面、透彻，深入浅出，寓意深远。善于分析是毛泽东的基本品格之一，其他的不少品格如高瞻远瞩等可以说就是由这一品格派生的。而毛泽东分析事物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利用分析来作出决策。人们熟知的毛泽东发动群众的方法“抓两头，带中间”就是一例。

毛泽东发现一条定律：“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根据这个定律，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很有效的发动群众的方法，这就是“抓两头带中间”。

他兴奋地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抓住两头就可以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介绍的一条方法。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就把这一诀窍作为一条重要的领导方法传授给了各级领导者，他说：“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



作为领导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在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也是采用了这套办法：“我们先把热心的人搞进来，然后向第二部分人宣传，热心了又进来，再向第三部分人宣传。”他告诉各级领导：“要分期分批。一切的人将来都要入社的，”群众要是闹起事来，可不好办，因为这表示领导和群众间出现了对立，但毛泽东也有办法，并且还是那套办法：“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最后只剩下极少数极少数反对我们的人。他们不站到我们这一边，也不要紧，因为他们已被孤立，想闹也闹不起来。不但闹不起来，还要受到原来跟着他一起闹事的广大群众的制裁，叫他尝到被冷落、被划清界线、被反戈一击的味道。”

为什么两头一抓，整个群体就动了起来，向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运动呢？毛泽东看准了“两头小中间大”这条朴素真理。那就是说，任何事情，总有人赞成，总有人反对，总有积极的，总有消极的。而最积极最赞成的和最消极最反对的都是少数。少数对少数，本见不出高低。关键在中间的那个大头。他们随大流，看两头哪一头占优势、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就向哪一头运动。你据两头一抓，中间那动摇不定、不明方向的群众就知道该向哪边看齐了，于是中间部分发生分化，积极分子、拥护的人越来越多，而消极分子、反对的人则越来越少。这样整个三部分群众就都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运动起来。

怎样抓两头呢？其实很简单：对积极先进的那一头加以表彰、奖励，对消极、落后的那一头加以批评、惩戒；号召人们向好的学习，而不要向坏的学习。这样一褒一贬，一学一批，就等于在混沌未分、是非不明的群众中树起了两个对立面：一边是红旗，是正面典型，舆论的光辉纷纷投向他们，广大群众自然会引以为榜样，向他们看齐；另一边是白旗，是反面教员，舆论的锋芒纷纷对准他们，广大群众必定会引以为戒，远远地离开他们。正面教员和反面教员同时起作用，何去何从一清

二楚。如此两边合击，中间哪有不动？中间既动，整个群众哪有不动之理？

古今政治家都知道如何通过赏好惩坏来齐众。但是他们在赏好时，必须拿出诱人的物质利益，重赏之下才有勇夫。这样势必要牺牲许多黄金绢帛。同时这样做又很有局限，不可能遍赏天下。如果你有财力遍赏，那奖赏又失去了激发作用。毛泽东长期处于艰苦创业之中，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黄金美钞赏给那么多好样的官兵民群，因此必须把重点放在精神激励上面。这种精神刺激本来不一定会为人们带来多少实惠，但它却可以提供恒久的动力，往往比物质奖赏更有效。其奥秘在于“抓两头”，逐步策动中间，即通过表扬好的、谴责坏的，造成一种广泛的舆论压力。由于这种扬善贬恶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群众运动，不需要你投入多少实惠，就会使群众发生分化，渐渐形成一种政治氛围，使运动中的每个人都面临着一种何去何从、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果他不站到红旗底下，他就有可能被大多数所抛弃，最后发现站到了白旗下面。这样一种激发机制虽然不必动用金钱，却足以推动中间状态发生分化，推动整个人群向着插红旗的地方运动。但是，由于精神奖励不会造成财政紧张，又会带来一个坏处，使得那些不太高明的领导者误以为精神刺激是万能的，频繁地树先进，插红旗，弄得先进典型遍地皆是，群众学不胜学。好样的太多了，势必庸俗化，失去感召力。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回到毛泽东的思路上来：除了学习好样的，还得批判坏样的，同时抓住两头，通过对立面的斗争来激发广大群众。

总之，分析是思维的基础。没有分析就没有思维，甚至没有认识，如我们对事物或现象意义的认识也必须依赖于思维——一个现象可以由多个不同的事物或多种不同的原因所引起，由于引起它的原因不同，一个现象也就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在众多可能的原因中到底是由哪一种或哪几种原因所引起，必须通过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才能获得对现象意义的正确理解，而这是认识事物的前提。可见掌握分析的方法，培养善于分析的品格，养成勤于分析的习惯是十分重要的。